

王

WANG

羲

XI

之

ZH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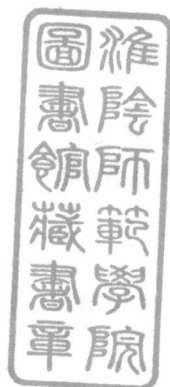
類有衣視也擇切
割不轉自膝至
以少至增咸



1470530

王羲之

中國書法大師經典系列



趙宏 李健秋◎編著



淮陰師範圖書館1470530

中國書店

圖書在版編目 (C I P) 數據

中國書法大師經典系列. 王羲之 / 趙宏, 李健秋編著.
—北京: 中國書店, 2012.4
ISBN 978-7-5149-0258-7

I. ①中… II. ①趙… ②李… III. ①漢字 - 法書 -
中國 - 東晉時代 ②王羲之 (321 ~ 379) - 書法評論 IV.
① J292.21 ② J292.1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2) 第 074984 號

中國書法大師經典系列. 王羲之

編 著: 趙 宏 李健秋

責任編輯: 袁 瀛

策 劃: 藝美聯

出 版: 中國書店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區琉璃廠東街 115 號
郵 編: 100050
印 刷: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開 本: 787mm × 1092mm 1/8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張: 72
書 號: ISBN 978-7-5149-0258-7
定 價: 280.00 元

本版圖書如有印裝質量不合格者, 本社負責調換。

序暨凡例

王羲之字逸少，生卒年有諸種說法，至今尚未定讞。如生年有太安二年（三〇三）、永嘉元年（三〇七）、太興四年（三二一），卒年則有升平五年（三六一）、太元三年（三七九）之說，但一般認為王羲之去世時年五十九歲。王羲之原籍琅琊（今屬山東臨沂），後徙居會稽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。琅琊王氏為東晉著名的門閥貴族，其伯父王導位居宰輔，為東晉開國元勳，另一位伯父王敦也是擁兵自重的一代梟雄。王羲之曾歷任秘書郎、庾亮參軍、江州刺史、會稽內史，因會稽內史任上帶有「右軍將軍」的名號，故世稱「王右軍」。王羲之辭官後，隱居於會稽境內，悠游山水，直至辭世。

王羲之十二歲時經父親傳授筆法論，「語以大綱，即有所悟」。又從衛夫人習書，楷、隸、行、草、飛白書諸體皆能，後增損古法，「兼撮衆法，備成一家」，一改魏晉質樸淳厚之風，創以雄逸矯健、媚麗流美、中和典雅的書風，最終達到「貴越群品，古今莫二」的高度。盡管在南朝時，人們還曾對「四賢」（張芝、鍾繇、王羲之、王獻之）的高下有過爭議，但自唐初太宗以「盡善盡美」為譽，李嗣真《書後品》又以「書聖」頭銜冠於王羲之之顛後，他在中國書法史上

的地位就無人能及。這時的王羲之作為「書聖」，不僅代表着當時書法藝術的最高峰，還引領、影響着後世書法發展的方向。王羲之的書法給後世留下的也絕不僅僅是一種風格，而是一個體系。我們既可將這個書法藝術的體系視為一棵繁茂的大樹，王羲之就是這棵大樹的根幹，以其自身的內涵滋養着後世衆多的追隨者，也由此生發出至今仍一派生機的繁枝茂葉。我們也可將這個體系視為一座高聳入雲的山峰，王羲之就是這座山峰的頂峰，他的高度為後來者指引着方向，也成為後世另立山頭欲與比肩者的目標，雖然後來者的高度不一，但層巒迭嶂簇擁着的主峰却顯得更加高大，更加雄偉。在這個體系之內，不僅有典雅、莊重，也有飄逸、流美；既有對立，也有和諧；既有情感，也有理智；既有法則，也有自由；既有浪漫，也有現實；既有陽剛，也有陰柔……王羲之正是這個體系的始創者，後世大家如唐之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李邕、顏魯公、柳公權，五代之楊凝式，宋之蘇軾、黃庭堅、米芾、蔡襄，元之趙孟頫，明之文徵明、祝允明、董其昌等，幾乎沒有任何人能和「書聖」脫離幹係。

那王羲之緣何取得如此高的成就？其中原因固與唐太宗的大力掄

揚有關，也有魏晉時期歷史文化背景的影響，以及王羲之書風符合中國傳統的思想審美，還有王羲之的家族、師承等因素，但起決定因素的還應是王羲之自身在書法藝術上取得的成就，他對書法藝術獨有的感悟，他在藝術上的天分，他的性格氣質等等，這些都在其書法作品上得到充分體現。所以，歸根到底我們還應從王羲之書法作品本身來分析他的藝術成就。

最令人遺憾的是，經過歷史長河中的無數次洗劫，「書聖」王羲之現今已無一件原作真迹流傳，我們所能看到的都是後人的複製品：或是雙鉤填廓的響拓本，或是屢經翻刻的刻帖本，或是後人據之書寫的臨寫本，當然，也不乏後人的偽造、偽托本。我們從復制的方法上可以得知，有些復制品中的精品與原作幾乎無別，甚至有些還被前人一直以真迹視之，如清乾隆皇帝「三希堂」所收的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。有些優秀的摹本甚至將王羲之書寫時的塗抹、修改以及墨色濃淡的變化也能一并表現出來，如傳為唐宮廷專業拓書人馮承素所摹神龍本《蘭亭集序》，完全可以當作真迹來看，故前人曾有「不見唐摹不足以言知書」之語，我們以這些作品來研究王羲之的書法風格、成就，應該是可靠、沒有問題的。此外，歷代的刻帖精品一向被人視為「下真迹一等」，也應是我們學習研究的主要對象。這些拓本又有刻本的早晚、拓工的優劣、內容的真偽等等爭議，但經王澐、翁方綱、沈復燦、張伯英、容庚等歷代學者的考證研究，這些刻本的真偽、優劣等已大致有了定論，我們盡可據以去偽存真、汰劣取優。故本書采取以書作的類型來編排王羲之作品順序的體例，試述如下：

首先是墨迹，包括摹本和臨寫本兩大類。摹本即為上述流傳有緒

的「唐摹本」，而臨寫本雖不可避免地留下書寫者的痕迹，但由於臨寫者（如虞世南、褚遂良）的書寫水平非同一般，也基本反映了王羲之的面貌神采。另外，在墨迹部分所收的「蘭亭八柱」本中，我們不但收了原作，還將前後的序跋、題詞、鑒藏印章也一并收錄，除為了保持它的完整性，使讀者能夠清晰地看到作品的遞藏關繫以外，也有意使讀者從這些題跋中欣賞一下歷代書風的演進，因為該件作品的歷代收藏者、觀題者大多都是有很高文化素養的文人，有的本身也是書家，所書不僅文辭佳美，其藝術性也足堪取法。墨迹部分我們主要采取按收藏地（博物館、私人機構等）進行編排的方式，以期眉目清晰。

其次是刻帖。歷代刻帖輾轉翻刻，譜系繁復，難以勝數，也難以盡收。本書收錄的原則是真、早、佳，並盡量汰其重複。《淳化閣帖》為叢帖之祖，共十卷，所收王羲之作品獨占三卷，刻工亦精，但編者王著賞鑒不精，屢有贗品竄入，已經歷代學者指出。但為了保證三卷的完整性，且有些雖屬偽物，却甚佳美，亦足堪取法，故仍加以保留。一些名刻如《大觀帖》因與已收帖多有重複而祇好忍痛割愛，所收其他刻帖主要起拾遺補闕之用，如《寶晉齋法帖》所收《官奴帖》、《澄清堂帖》所收《豹奴帖》等。至於個別重複者如《旗闕帖》，既收刻本《十七帖》之《旗闕胡桃帖》，又收現藏大英圖書館的敦煌石室臨本，二者一為刻本，一為唐人臨本，讀者互為參看，或許另有所悟。本部開篇所收《定武〈蘭亭〉》亦為此義，該本在帖學史上頗受尊崇，其實不過是以初唐歐陽詢的《蘭亭序》臨本為祖本刻石而成，我們予以收錄，亦可使讀者據之與「神龍」《蘭亭》墨迹本詳加對比，以明刻帖與「唐摹」之區別。

第三部分是集王碑刻。集王羲之書迹成爲碑刻，始於唐咸亨三年（六七二），懷仁和尚集王羲之行書而成的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。

《三藏聖教序》本是唐太宗爲表彰玄奘法師赴西域各國求取佛經，翻譯三藏要籍而作。懷仁乃長安弘福寺僧，積二十四年，煞費苦心，集摹王羲之書迹而成此碑，可謂「逸少真迹，咸萃其中」。由於懷仁於書學有着深厚造詣，且所集書不論點畫形態、氣勢，還是起落轉收，皆能纖微畢肖，充分體現了王書之韻味。若我們能够忽略其在集字上無法避免的一些局限性，如整體章法的刻板，重複之字難以變化，偏旁拼合造成結體缺乏呼應等，作爲研究、學習「書聖」書法藝術的模範還是有很高價值的，尤其是字數甚多，爲學習王書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。故自此碑以後，後世效仿者甚多，如僧大雅所集《興福寺斷

碑》、唐玄序所集《金剛經》等，均屬佳作，本書一并加以收錄，以饗讀者。

第四部分專收王羲之的小楷書。三國鍾繇被後人尊爲「正書之祖」，其代表作如《宣示表》、《薦季直表》等，字形趨於方扁，用筆尚未脫盡隸勢。王羲之則一變鍾繇小楷的古樸、稚拙，風格典雅、秀美、靈動，唐褚遂良《拓本〈樂毅〉記》曾以「筆勢精妙，備盡楷則」贊之。王羲之的小楷不僅爲楷書字體的演變定型打下了基礎，而且骨肉兼備，剛柔相濟，豐腴含蘊，能於瀟灑縱橫之間寫出魏晉飄逸之氣。本部分揀選佳本，收錄了王羲之的著名小楷作品，如《樂毅論》、《黃庭經》、《東方朔畫贊》、《孝女曹娥碑》，皆爲歷代學習王羲之小楷的最佳範本。

孟子曾稱：「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。」故本書除了作品的圖版編排依據以上體例外，尚列有《王羲之評傳》、《王羲之年譜》等文，以使讀者能對王羲之所處時代背景、生平、交游、藝術成就、藝術地位等諸多方面有所了解，這將對理解王羲之的書法藝術、理解王羲之爲何成爲千古「書聖」有些助益。



《蘭亭序》

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王羲之評傳

時勢造英雄——藝術家生活的時代

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動蕩的時代，魏晉南北朝為中國文化做出了特別的貢獻：玄學的興起，為中國哲學吹入一股思辨的清風；阮籍、嵇康、左思、陶淵明，在文學史上刻下一段無可回避的印記；顧愷之的畫，又為中國繪畫藝術的真正確立奠定了根基。可以說，在政治民生上，魏晉南北朝是極混亂而黑暗的，而在文化建樹上，它又是極豐富而輝煌的。

生命意識的覺醒，是這一時期思想文化生活的一個重要特點。東漢末期以後，戰亂連年，「白骨露於野，千里無鷄鳴」。人命如草，隨時可能被馬蹄踐踏。這種生死無常的憂患意識，也成為士人們思考與藝術創作的主题之一。

偉大的書法家王羲之，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了矛盾和激情的時代。

王羲之的生卒年，歷來是一個較有爭議的問題。《晉書·王羲之傳》僅稱其「年五十九卒」，未言生卒何年。與王羲之的生活年代較近的陶弘景稱羲之「升平五年辛酉歲亡，年五十九」，唐人張懷瓘等亦從此說。據此推演，王羲之的生年應為西晉太安二年，即公元三

〇三年。

王羲之的大半生，從十四歲到去世，都生活在東晉。作為當時文化精英的名士，他對那個時代文化風潮的形成，有相當的推動作用，而他的存在，也讓後代學習書法的人對公元四世紀的江南產生無限神往。但作為一個個體，他更多的是從當時的文化思潮中受到影響，這種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書法藝術。

從歷史上看，東晉偏安江左，國祚不長（三一七—四二〇），不過一百零三年，但在中國文藝思想史上，却是一個不可忽略的時期，正是在這百多年間，一種高雅脫俗、富含韻味的文化模式真正走向成熟，連帶着的建立起來的，是崇尚寧靜幽雅的審美情趣、清逸悠游的人生實踐方式。它們為以後的中國文人指出一條寄托心靈的道路，一種人生境界。在文學上，表現為陶淵明的詩；在書法上，則表現為王羲之的字。

歷史選擇在東晉時期成就這樣一個範式，是有其內在邏輯的。先秦時期，是中華文化產生的軸心時代，百家爭鳴，為文化的定型做着準備工作；兩漢時期，官方思想定儒學為一尊，為儒學在文化中的統

治地位打下了基礎；漢末建安以來，儒家正統觀念淡化，經學對人們的束縛逐漸寬鬆，受過良好教育的士人，不必在皓首窮經中揮散他們的智慧，玄學的興起、佛學的東漸，極大地提升了他們的理論思維水平，與之一同發展起來的，還有他們對藝術美的創造和鑒賞力。

還有一點必須提及的，是當時黑暗、動蕩的政治環境。司馬氏政權起家手段之陰謀歹毒，在當時和後世都為人所批評，而他們所建立的王朝，其齷齪險惡也令正直士人幾乎無法容身。西晉立國之初，為了強迫時人認同其政權的合理性，不惜舉起屠刀，殺了何晏、嵇康等一批名士。這種血腥的強權手段，固然收到一定效果，迫使一些桀驁的名士不得不屈服，但也摧毀了當時士林的風氣：既然儒家所倡導的正直、進取乃至狂狷都無處施為，那麼道家的全身遠禍、修真養性便占了上風。這種時代心態進一步發展，便表現為玄學發展到後期的放達，士人們不再關注責任、家國、天下等「大」的概念，而是轉而追求任情自適，甚至流於放誕荒唐。這種轉化，無論是從理論上，還是從行為上，都對封建政權構成某種破壞與瓦解。這也成為西晉滅亡的內部原因。

永嘉南渡後，亂亡之痛迫使士人們對前期的行為作出反省，那種過分放達、乃至流於放縱的風氣得到抑制。他們站在維護名教的立場上，試圖借助儒家的思想武器對時代思潮進行一番「撥亂反正」，但收效頗微，既缺少理論建樹，也沒有現實的號召力。另一方面，東渡後偏安的政治局面、秀美的江南景色，又使士人的人生理想和審美趣味逐漸轉向追求內心的平和，追求寧靜閑雅、蕭散飄逸的風神之美。而這種轉變，無疑對藝術的發展有着絕大的影響。

這些時代的風尚，不可避免地成為王羲之書法成就的文化和心理背景。他從自己的時代中汲取了文化的養料，又以其無可比擬的藝術天才成為後世一代代書家的楷模。

翩翩世家子——高貴的出身與家世

王羲之出身於琅琊（今山東臨沂）王氏，這在當時是一個權傾朝野的世家大族。

琅琊王氏的先祖，可追溯到漢代名臣諫議大夫王吉，至漢末魏晉時期，王氏已成為當時豪族。王羲之曾祖輩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王祥，他就是「二十四孝」中「卧冰求鯉」故事的主人公，在當時頗有令名，是西晉開國的元老之一。其他的族人如王戎、王衍等，都曾官至高位，是朝中舉足輕重的人物。而到了東晉，琅琊王氏與司馬氏政權的關係更為密切：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，起家時為琅琊王，與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王導、王曠（羲之父）是姨表兄弟，兩家世代聯姻，關係非常密切。

羲之的伯父王導、族伯王敦，在東晉政權初立時期立下很大功勞，王導被尊稱為「仲父」，而王敦更是控制朝政，甚至兩度擁兵欲廢晉自立。時人有「王與馬，共天下」之語，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琅琊王氏在當時的地位。

出生於這樣一個世家大族，王羲之自小受到了很好的教育，感受着那種精緻文雅情調的浸潤濡染。單就書法來說，他的長輩中就有多

位愛好并精於書法的：他的伯父王導擅長楷書，「好愛無厭」，即使是在永嘉南渡逃難時，仍不忘將鍾繇的《尚書宣示帖》藏於衣帶中。他的叔父王廙，是當時最著名的書家之一，工於草隸、飛白，「其飛白志氣極古」（王僧虔《論書》），是羲之的啓蒙老師。王廙還擅繪畫，王羲之嘗從其學畫，有《雜獸圖》、《臨鏡寫真圖》等畫作傳於前代。

王羲之七歲學書，當時的老師除了叔父王廙，還有家族中的其他長輩，他的父母也給了他很多指點。年齡稍長，家人又爲他請了另一位老師衛夫人。衛夫人名鑠，字茂漪，汝陰太守李矩之妻，是當時最著名的書法家之一。

他十二歲時，偶然間發現父親枕中藏有鍾繇的書法論著《筆論》，如獲至寶，偷偷拿來讀，被他的母親發現了。母親認爲他年齡太小，不能理解這種理論色彩很濃的書法論著，父親王曠也說，等到羲之長大成，再教給他。而羲之却說，等到長大再學，就已經太晚了！王曠見兒子求學心切，欣喜之餘，便開始給他仔細講解。理解了這部書法論著後，王羲之的書法功力大有長進。不久後，衛夫人敏銳地發現了他書法的變化，對人說：「這個孩子，他一定系統地學過用筆的方法，現在看他的字，雖然祇是個少年寫的，却有了老練成熟的味道（此小兒必見用筆訣也，近觀其書，便有老成之智）。」

可以說，羲之學書，一開始就是取法乎上，所接觸的是當時水平最高的老師，所目見的也是前代最優秀的作品，這種高層次的書法啓蒙，爲他後來的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

王羲之的父親王曠曾任丹陽和淮南太守，是個頗有見識和政治影

響力的人。在西晉末期的政治環境下，首先向晉元帝提出南渡的建議，對東晉王朝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貢獻。可惜天不假年，就在永嘉南渡前後，王曠不幸去世了。那時王羲之不過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。

少年喪父，是人生一大不幸，但這種不幸往往也會使人成熟。王羲之天賦聰敏，又受過極好的教育，父親的去世讓他迅速成熟起來。據說羲之少時「訥於言，人未之奇」。十幾歲時，他去見吏部尚書周顗，並參加了周家的一次宴會。周顗位高權重，閱人無數，却驚異地發覺王家的這個孩子很不一样。當時流行於大型宴會上準備牛心炙，也就是烤牛心。這是一種禮儀性的菜肴：侍者端上牛心炙後，主人要將其割開，按客人地位的高下將牛心炙逐一奉上。周顗一反常理，無視滿堂權貴的存在，將第一份牛心炙奉於王羲之前面。周顗在當時威望極高，他的青睞，自然讓人們對王羲之這個少年另眼相看。

除了周顗，許多名人都對王羲之評價甚高，如素享重名的阮裕，贊羲之與王悅（羲之伯父王導之子）、王應（羲之族伯王敦之子）爲「王氏三少」；王導和王敦更是視羲之爲家族的未來，對他寄予厚望。

公元三三二年，王羲之的家族遭遇一場重大的變故，險遭滅門之禍。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：東晉立國之後，屢遭北方政權如後漢、後趙等侵擾，征戰連年，兵源嚴重不足。元帝采納尚書令刁協的建議，下詔稱中原流民遭難、被迫賣身爲大戶僮僕者悉免爲平民，以供征役。這一政策嚴重侵害了大族的利益，一時間朝廷與大族的矛盾空前尖銳。王敦便以此爲由，在武昌（今湖北鄂城）起兵，也獲得一千豪族的支持。消息傳到建康，作爲王敦從弟的王導惶恐莫名，不得不率

全家待罪，元帝對王導也暗生猜忌，王氏一族處境十分危急。但後來幸得周顗等人在元帝面前爲之辯解，王導才又贏得元帝信任。是年十一月，元帝死，遺詔王導爲司徒，輔佐即位的太子司馬紹，即晉明帝。

當時王羲之剛滿二十歲，正跟從伯父王導生活，事件的整個過程都爲他所親身經歷。家族這一次的安危榮辱之變，想必給他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後來在仕途上的種種態度與選擇，與年少時的這段經歷也不無關係。

這場風波過後的第二年，便發生了著名的「東牀坦腹」的故事。

這也是王羲之青年時代最膾炙人口的一則軼聞。當時太尉郗鑒的女兒到了出嫁的年齡，郗鑒素聞王家子弟有「芝蘭玉樹」之美譽，就希望在王家選一個女婿。這樣做，一來可爲女兒的終身找一個可靠的依托，二來也可借此鞏固自己在朝中的勢力。他派門生拜見王導，申明此意，王導讓來人自己去東廂王家子弟中挑選。門生回來後稟告郗鑒說：「王家子弟都很出色，但一了解到我的來意，都未免有些不自然。祇有一個人袒腹臥於東牀，如若不聞（王氏諸少并佳，然聞信至，咸自矜持。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，獨若不聞）。」郗鑒聽了說：「正是這樣的人，才是佳婿！」派人打聽，這個人就是王羲之，郗鑒就把女兒嫁給了他，當時王羲之二十一歲。

郗鑒於此年由兗州刺史遷尚書令，正亟欲擴大自己的勢力，而王家剛從一場政治災難中逃脫，也希望在朝廷中廣植黨羽。兩家聯姻，實際上有很强的政治功利目的。但從歷史的記載看，這段政治婚姻倒堪稱美滿：郗夫人名璇，字少房，亦「甚工書」。她與王羲之生活了

近四十年，育有七子一女，其中包括享有盛名的書法家王獻之。後來郗氏享年九十餘而卒。

進退兩茫然——王羲之的仕與隱

王羲之早年（二十多歲時）以秘書郎身份入仕。秘書郎主要負責管理皇室藏書、起草政令公告等，相當於皇帝身邊的行政人員，是一份「職閑廩重」的官職，在當時祇有名門望族的子弟才有資格擔任，是貴族子弟進入仕途的理想起點。

據史傳記載，成年後的王羲之，逐漸脫去了少年時的青澀寡言，變得言辭敏捷、出口成章，待人接物也素以耿直爽朗見稱。當時的風氣，尚清談，重風度，羲之的才華與性格自然很爲時人欣賞。《晉書·王羲之傳》載：「羲之既少有美譽，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，頻召爲侍中、吏部尚書。」就連當時的權臣庾亮，雖從自身利害出發，排擠其政治對頭王導，遏制琅瑯王氏的勢力，但對王羲之却一直頗爲欣賞。他任征西將軍後，便「請（王羲之）爲參軍，累遷長史」。庾亮去世前，還特意上疏舉薦羲之，稱其「清貴有鑒裁」。

出身名門、才能出衆的王羲之，在仕途上自然有比大多數人更多的機會，但不知道爲什麼，王羲之似乎一直在躲避着這些常人夢寐以求的機遇，所以，他的仕宦經歷中也缺乏人們想象的那種「輝煌」。他初作秘書郎時，正值伯父王導輔政，王導一直很看重這個侄子，有意授以要職，好好培養他，但王羲之拒絕了伯父的安排。當時朝中公

卿也都欣賞他，多次邀他出任侍中、吏部尚書等職，這些位置都是親近皇帝、靠近權力核心的要職，但王羲之還是拒絕了。一直到公元三四〇年，王羲之已經三十八歲了，才受庾亮臨終舉薦，離開秘書郎位置，任寧遠將軍、江州刺史。進入仕途十幾年始任此職，以他的家世和才能，實在是很緩慢的升遷。究其原因，也許還是歸結到四個字：無意仕進。用他自己的話說：「吾素無廊廟志……自兒娶女嫁，便懷尚子平之志，數與親知言之，非一日也。」

公元三四八年，也就是王羲之四十六歲時，朝廷又一次任命他為護軍將軍，他又一次推辭。當時，東晉政權內部有兩派勢力，一是桓溫，一是會稽王司馬昱。前者因平蜀功大，被封為臨賀郡公；後者則為王室，後為簡文帝。司馬昱為制衡桓溫勢力，擢素有盛名的揚州刺史殷浩參政，以與桓溫抗衡。殷浩與王羲之的私交甚好，薦舉王羲之出任護軍將軍的，就是殷浩。所以，對王羲之的推辭，殷浩很着急，特意寫了一封信，勸說王羲之接受這個職位。也許是感於友人的盛情，王羲之決定接受這一任命，他回信說：「若蒙驅使，關隴巴蜀皆所不辭……若不以吾輕微，無所為疑，宜及初冬以行。吾惟恭以待命。」

王羲之與殷浩私交甚好，也因此為殷浩所提拔重用，但他却能冷靜地看出司馬氏政權利用殷浩制衡桓溫勢力的用心，並勸殷浩以大局為重，不要投身於爭權奪利的政治漩渦中。他寫給殷浩的《答殷浩書》、寫給周撫的《譙周有孫》等帖，都談到了這一問題。可惜殷浩沒有聽從羲之的忠告，最終落得個悲劇性的結局。

王羲之任護軍將軍後，曾苦求宣城郡，但未被批准。為何王羲之向來懶於仕進，却偏偏對宣城太守一職情有獨鍾？實際原因是宣城素

以山水秀美著稱，王羲之之求宣城，更多的不是為了仕途發展，而是希望到那裏享受山水之美。游心山水之間，體悟玄思哲理，是魏晉士人普遍向往的生活方式。《世說新語》中記載了大量這樣的逸事與言論，這種時代風尚的形成，與老莊思想的影響有直接關係，「莊子對世俗感到沉濁而要求超越世俗之上的思想，會於不知不覺之中，使人要求超越人間世而歸向自然，並主動地去追尋自然……使人進一步想在自然中——山水中安頓生命」（徐復觀《中國藝術精神》，華東師大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，第一百三十七頁）。

從史傳中透露出的這小小細節告訴我們，在世俗仕宦與自然山水之間求得某種平衡，才是王羲之所向往的理想人生。前者於他來說是一種義務，是家族賦予他的使命；後者於他來說則是性情所致，是舒展心靈的最好方式。

其實以王羲之的本意和經濟狀況而言，徹底的歸隱也許是最理想的。但從當時的形勢來說，這個決定很難做出：作為名門望族的優秀子弟，他承擔着家族的厚望；同時，在當時司馬氏政權的政治高壓下，辭職歸隱也意味着着政治上的不合作，甚至會招來殺身之禍。

在中國歷史上，個人相對於政權的獨立性一直是不被鼓勵的。史傳和傳說中的那些隱士，如許由、伯夷叔齊、楚狂接輿等，他們的存在令帝王顏面無光，故而「野無餘賢」歷來被看作是太平盛世的象徵。秦及西漢時期，大一統封建帝國初建立，管理體制嚴密清晰，「東南一尉，西北一侯，徽以糾墨，制以質鈇」（揚雄《解嘲》），士人們更如籠中之鳥，其自由和獨立意志幾乎無從談起，所以隱士愈發如鳳毛麟角。很多士人不得不選擇違心地沉浮於官場，「避世於朝

廷間」(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)。

從東漢中晚期到魏晉，門閥世族的勢力逐漸膨脹，在一定程度上分解了皇權對士人的控制力度，隱逸之風又興，而帝王爲了爭取人心，也紛紛屈尊，向隱者表達出親和與善意，因而隱士的人生重新又成爲士人的一種理想。

西晉建國伊始，司馬氏家族深恐其篡權行爲爲時人詬病，所以對持不合作態度的異己分子格外無情。嵇康就刑、呂安獲罪，就是他們恐嚇士人的一個手段。在這種流血的政治面前，士人們不得不放棄隱逸的自由，服從於朝廷的召之即來揮之即去，但大多數人的選擇是「在朝不任職，容迹而已」(《晉書·向秀傳》)。王羲之有顯赫的家世背景，在朝多年却無意仕進，其實也和他們一樣，不過是把朝廷當做一個寄身的場所而已。

求宣城不得，王羲之被任命爲右軍將軍、會稽內史。任會稽內史的四年，是王羲之的人生中比較積極入世的時期。時值東南地區饑荒，民生艱難，而朝廷的捐稅勞役仍舊繁重，王羲之爲此深感憂慮，夙夜難眠，他一方面開倉賑糧，一方面又屢次上疏，要求朝廷減免賦役，而他的意見也多被採納。應當說，這一時期的王羲之，是一位爲百姓謀福利的父母官，他也在這種忙碌中找到了一個士人的價值所在。

這一時期，東晉政壇上的形勢也比較複雜，桓溫與司馬昱、殷浩兩派的權力之爭始終不斷：桓溫掌控六州軍事，又因平蜀之功而名聲大振，他希望通過北伐進一步擴張自己的軍事實力；輔政王司馬昱深感桓溫的威脅，不但不準桓溫北伐，反而提拔殷浩參政，共謀北伐，希望以此抗衡桓溫的勢力。因此，當時的北伐，已經不僅僅是一場軍

事行爲，而是一種權力抗衡的結果，在內部矛盾重重的形勢下開始北伐，顯然是非常冒險的。王羲之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，於是力勸殷浩和司馬昱停止北伐，但後者不肯聽從。最終導致了北伐的失敗，勞民傷財，而且殷浩自己也由此獲罪，被桓溫以北伐失敗爲借口彈劾，廢爲庶人，後鬱鬱而終。

殷浩失勢後，代替他任揚州刺史的，是出身於太原王氏的王述。據史傳記載，王述少時與羲之齊名，但王羲之很瞧不起他，兩人遂相交惡。王述先於羲之任會稽內史，後因母喪辭官，居會稽境內守喪。羲之任會稽內史，是接替他的職務的。按當時常例，繼任者對這種因母喪離職的前任，應當表現出相當的尊重。但王羲之則不然，他到任後，祇是禮節性地去王述家吊唁過一次，此後便絕不再往。而且，在與賓客閑談提到王述時，也很不以爲然。王述由是深恨羲之，等他做了揚州刺史，成了王羲之的上司，赴任前周行各界，而偏不訪羲之。羲之不願意讓王述做他的直接上司，於是遣使者詣朝廷，請求將會稽分到越州管轄，但由於使者的言辭不當，這一請求不但未得許可，反而貽人笑柄。王述上任後，果然開始刁難羲之，他派人嚴查會稽郡的司法財務狀況，使羲之的手下疲於應對。面對這種形勢，王羲之不願再忍受下去了，遂稱病辭官。他在父母的墓前發誓，並寫了一篇著名的《告誓文》：「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，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：羲之不天，夙遭閔凶，不蒙過庭之訓。母兄鞠育，得漸庶幾，遂因人乏，蒙國寵榮。進無忠孝之節，退違推賢之義，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誠，常恐死亡無日，憂及宗祀，豈在微身而已。是用寤寐永嘆，若墜深谷；止足之分，定之於今。謹以今月吉辰，肆筵設席，稽

類歸誠，告誓先靈，自今之後敢渝此心，貪冒苟進，是有無尊之心而不予也！子而不予，天地所不覆載，名教所不得容！信誓之誠，有如皦日！」誓墓不仕，在當時是很令人吃驚的行爲。朝廷以其誓苦，便不再強迫他出來做官。

辭官之後的最初幾年，王羲之與友人遍遊江南山水，乘大舟出海，沉醉於弋釣之樂，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，采藥於名山，甚至發出這樣的感嘆：「我卒當以樂死！」應當說，這一段歸隱生活是他真正比較愜意的日子。他不必再受制於官場的各類規則，真正地做了一個自由自在的隱士。他在給謝萬的信中寫到：「古之辭世者，或被髮佯狂，或污身穢迹，可謂艱矣！今僕坐而獲免，遂其宿心，其爲慶幸，豈非天賜？違天不祥！頃東遊還，修植桑果，今盛敷榮。率諸子、抱弱孫，遊觀其間，有一味之甘，割而分之，以娛目前。雖植德無殊邈，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。或有輕薄，庶令舉策數馬，彷彿萬石之風。君謂此何如？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，并行田，視地利，頤養閑暇，衣食之餘，欲與親知時共歡燕，雖不能興言高咏，銜杯引滿，語田裏所行，故以爲撫掌之資。其爲得意可勝言邪？常依陸賈、班嗣、楊王孫之處世，甚欲希風數子，老夫志願盡於此也！」

但好景不長，他的健康狀況逐漸惡化，這恐怕與他長年服食五石散有一定關係。五石散是一種中藥散劑，據說最早由張仲景發明，其主要成分是石鐘乳、紫石英、白石英、石硫磺、赤石脂等五種礦石，藥性燥熱，對傷寒病人的康復頗有幫助。健康人服用之後，也會覺得「神明開朗」（何晏語）。故而服散成爲當時士人中非常流行的一種養生方式，它與「清談」、「玄學」、「好酒」一道，成爲魏晉風度

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但五石散畢竟是一種帶毒性的化學藥品，久服不但容易上癮，還會累積性地中毒。西晉時期的學者皇甫謐就曾因服散不當而患「風痺疾」，以致癱瘓。王羲之晚年也是因「風疾」而艱於行走，服散很可能就是致病的一個原因。

穆帝升平五年（三六一），王羲之病逝，享年五十九歲，葬於金庭（今屬浙江嵊縣）。羲之去世後，夫人郗氏尚在，後壽至九十餘，享天年而終。

縱觀王羲之一生的仕宦經歷，我們會發現，他真的是一位性情中人。首先，他對名利非常淡泊，他寧願在政壇被邊緣化，也不願在權力鬥爭中磨損性靈。這一方面是時代風尚的影響：魏晉時期政治太過黑暗，很多有良知有底綫的士人都無法忍受權力圈中的齷齪與血腥，紛紛選擇逃避，玄學與隱逸之風盛行，前者是一種精神的逃避，後者則是自我的徹底放逐。另一方面，也不排除王羲之的個性因素：他是個藝術才能非常卓越的人，在書法、繪畫、文學創作方面都有極高造詣。這樣的人，他們的內心世界一定是非常完滿的，敏銳的審美能力，會隨時爲他們的生活增添豐富的色彩。內心充實，自然也就無求於外，相反，過多的外務瑣事，反而會干擾他們享受藝術、享受生活、寧靜心情。據說，王羲之在仕途上唯一一次主動求官，就是求任宣城太守一職。而之所以「苦求宣城太守」，歸根結底，却是因爲宣城山水極秀美，他的求官，是真正的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」。因爲更看重自由與美，所以才會淡於名利，王羲之的理想國，不是在廟堂之上，而是在山水與藝術之間。

同時，王羲之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，他重情義，容易被感動，

更容易被激怒。他無意仕宦，不耐官場的蠅營狗苟，本打算在一個閑職上終老。其兩次出仕，都是感於友人的真誠：一次是庾亮的臨終薦舉，一次則是殷浩的盛情相邀。而他最終徹底告別官場，也是起因於王述的有意刁難。

從這些逸事中可以看出，世人眼中的功名成就，遠遠不是王羲之的人生理想。他的心靈深處，始終藏着一個浪漫唯美、熱愛自然、熱愛自由、重情重義的少年。可以說，從個性上講，王羲之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。

盡善又盡美——王羲之的書法藝術

魏晉時期，書法藝術的發展空前迅速。它從剛剛取得獨立地位，很快就發展到了一個頂峰，王羲之的出現，就是最重要的標志。

儘管在南朝時，人們還曾對「四賢」（張芝、鍾繇、王羲之、王獻之）的高下有過爭議，但自唐初太宗以「盡善盡美」為譽，李嗣真《書後品》又以「書聖」頭銜冠於王羲之之顛後，王羲之的地位就變得無人能及，成為一座中國書法史乃至文化史上不可超越的高峰。

王羲之書法總體的特點，前人總結出很多，如梁武帝蕭衍曾稱「王羲之書字勢雄強，如龍跳天門，虎卧鳳闕」。古人常用龍、虎形容陽剛之美，以「龍跳虎卧」形容王羲之的書法，主要是指其筆力雄健的一面。另一方面，後世也有人認為王羲之的書法婉轉柔美，如唐人韓愈稱其「有女郎才，無丈夫氣」。這些看似矛盾的評價，也反映

了王羲之書法風格的奇詭多變，面貌豐富，《別傳》稱其字「千變萬化，得之神功……自然萬象，無以加也」，唐太宗李世民在《王羲之傳論》中也形容說「觀其點曳之工，裁成之妙，烟露結，狀若斷而還連；鳳龍蟠，勢如斜而反直」。王羲之不僅每個字、每行字的點劃變化莫測，就是每篇作品之間，也常常出現多種面貌，既有妍媚流美之作，也有雄健古質之風。故唐代張懷瓘稱其「真行妍美」、「耀文含質」，《墨林快事》謂其「寄巧於拙，藏老於嫩」，明初方孝孺言其「寓森嚴於縱逸，蓄圓勁於蹈厲」，都是說王羲之書法風格面貌具有極大的豐富性或多面性。

唐孫過庭在《書譜》中認為，王羲之之所以成為後世「取立指歸」的「宗匠」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王羲之真正做到了「會古通今」與「情深調合」。這其實也可視為所有成功書家的共同標準。我們試從這兩方面來闡釋王羲之的書法藝術。

書法藝術的學習，主要是通過對前代書法名家的作品進行反復臨摹，從中汲取營養，獲得書寫的能力，掌握書法這門造型藝術從用筆、結體到整體章法的內在規律，進而領悟書法的奧妙。「會古通今」就是要能兼采衆體，博取衆長，並加以融會貫通。這一點王羲之堪稱典範。據《別傳》云，「羲之善草、隸、八分、飛白、章、行，備精諸體，自成一家之法」（《書林藻鑒》引），而羊欣贊美王羲之「貴越群品，古今莫二」的原因，也是王羲之能够「博精群法，特善草、隸」且「兼撮衆法，備成一家」。唐人張懷瓘所著《書議》，在排列書家名次時，分「真書」、「行書」、「章書」、「草書」四門，每門所列書家，皆見王羲之。另外，張懷瓘在《書斷》中的「神

品二十五人」及「妙品九十八人」條目中，「飛白」、「八分」二門也列有王羲之。從這些評價中可以看到，在對前代各種字體的全面繼承上，王羲之是同期其他書家無法相比的。在繼承的基礎上，王羲之創造出一種新體，從而取代了在他之前的鍾繇、張芝的地位，並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。這一點是更重要的。王僧虔在《論書》曾說「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俱變古形，不爾，至今猶法鍾、張」，可見王羲之的新體對南朝的影響。王羲之的書法同鍾、張相比較，顯得新穎、流便，呈現出一種更輕便、妍媚的體勢，新意顯而易見。王羲之正是在「詳察古今，研精篆素」（唐太宗《王羲之傳論》）的基礎上，做到讓後人難以企及的「盡善盡美」的。

「情深調合」則是要求書者是個感情豐富，對外物有着極其敏銳觀察力的人，對自然、社會乃至家庭充滿深情的人。因為祇有這樣的人，才能够在某些特定的主客觀因素如自然環境、社會事件、人事變動等的激發下，用自己所擅長的藝術形式表達出來。這種情況下，對於擁有深厚書寫功力的書者而言，書法創作就變成很自然的事。孫過庭在其《書譜》中這樣描述王羲之的創作狀態：

寫《樂毅》則情多怫鬱，書《畫贊》則意涉瑰奇，《黃庭經》則怡懌虛無，《太師箴》又縱橫爭折。暨乎蘭亭興集，思逸神超；私門誠誓，情拘志慘。所謂涉樂方笑，言哀已嘆。

《樂毅》、《畫贊》、《黃庭經》、《太師箴》這些作品都有着特定的內容，而一些王羲之最著名的作品，如《蘭亭集序》、《喪亂帖》等，其創作緣由，也出於一種對生命無常的沉重思考。王羲之書寫時，能從作品的文字內容出發，使作品的風格與內容相契合，使書



《黃庭經》

法創作真正做到「達其情性，形其哀樂」（孫過庭《書譜》）。這種境界，才堪稱真正的藝術創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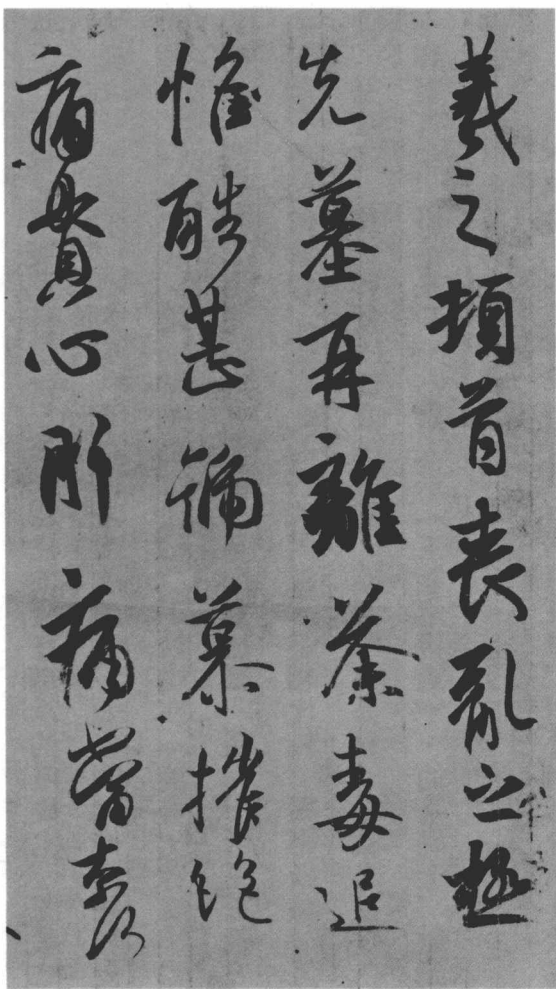
王羲之的書法創作實踐以及他所取得的成果，向世人宣示出書法藝術的真諦：書法是一種表情達性的藝術，這也是所有藝術的通則。

以號稱「天下第一行書」的《蘭亭序》為例，它的產生，就有着特殊的主客觀因素：客觀因素是「崇山峻嶺」、「茂林修竹」、「清流激湍」以及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」這些足以愉悅身心的優美環境；主觀因素則是，作為會稽內史的王羲之作東邀請當時的社會名流於蘭亭雅集，行「修禊」之事，眾人於「流觴曲水」之中「暢叙幽情」，又「仰觀宇宙之大，俯察品類之盛」，可謂「極視聽之娛」，在此情景下，王羲之「感慨係之矣」，感嘆「世殊事異」以及死生齊一說法的虛誕，遂於微醺狀態下，「臨文嗟悼」書寫出這一千古絕

作。通篇作品中所蘊含的悲天憫人的深厚情感，即使在幾千年後，也能發散於文字之外，令人感懷動容。這樣的作品，才是真正的藝術創作，與那些缺乏感情投入的應酬敷衍之作相比，其間距離，豈止天壤！

正是因為王羲之做到了「會古通今」與「情深調合」，才能創作出那麼多風格各異的藝術珍品！除了《蘭亭序》，我們還可分析王羲之流傳後世的另外兩件典型作品，即《喪亂帖》、《姨母帖》。二帖與《蘭亭序》一樣都是行書，而行書在各字體中最能體現書寫者的情感和對書法的感悟能力。我們發覺，二帖在文字內容上情感類似，但書法風格却是迥然相異，若能找到這種明顯差異的原因，對理解王羲之的書法成就當有極大的益處。

《喪亂帖》原為日本內府所藏，在中唐時就已流入日本。王玉池先生據《舊京先墓帖》等考證，此帖的寫作時間應在東晉永和七年



《喪亂帖》

至十二年（三五—三五六）之間，當屬王羲之晚年所書，屬王羲之「末年多妙」之迹。該帖雖僅八行五十六個字，但其本身就是一篇優秀的雜文——右軍其他傳世書帖，大部分是便條或一般的慰問之書，遠不如此帖一往情深，文理為優。中國人最重祖宗觀念，而作為東晉士家大族子弟的王羲之，祖墳被異族「荼毒」污辱，雖身為右軍將軍却無能為力，甚至無法親至先輩墓前盡一份力，而祇能發出「痛當奈何，痛當奈何」呼天搶地的哀號，心情確可稱得上「哀毒益深」。有了如此深刻的情感體驗，再加上過人的才力，故此帖通篇文字感人尤深。

此帖字勢雄強，屬於姿媚流便一路，但仍未完全失去古意。開頭兩行比較規矩，字勢也比較凝重，後而逐漸放開，一貫到底，瀟灑自然，寫至動情處，整個豎行都向右傾斜了。「喪亂之極」四字的末筆，縱而能收，垂而猶縮，緊湊含蓄，是王字的重要特徵；另一特徵是欹側取姿，如「荼」字，整個字在全篇中傾斜明顯，「毒」字上部的正，與「母」字在下部的傾斜，却以一橫將重心調穩，精彩之極。此外，《喪亂帖》的筆法也可說是跌宕起伏，其用筆上最大的特點是行筆以側鋒為主，而毛筆在欹側狀態時，任何微小的動作、起伏都會馬上反映到筆劃的粗細上，從而顯得筆法變化極為豐富，如「頓」、「墓」等字，筆劃由細變粗的幅度都相當大，此即古人所稱的「側鋒取妍」。但側鋒并非偏鋒，否則筆劃則會扁軟。但我們看，王羲之以其深厚的功力，熟練地駕馭着毛筆，再配以當時悲憤、激動、跌宕的心情，創作出為後世所景仰的書法作品來。

《姨母帖》為唐摹《萬歲通天帖》中的第一帖，是武則天於萬歲

通天二年（六九七），命人據琅玕王氏十世孫王方慶所進家傳墨迹而摹。一般研究者多認為《姨母帖》是王羲之早年之作，原因是此帖書風樸厚多隸意，而乏其他各帖適美俊逸之態。但也有人提出異議，如王玉池先生認為也有王羲之晚期的可能。文中「頃遘」下空出，「姨母」上提，以示尊敬。此書儀在宋人尺牘中大量使用，而東晉時業已出現，但并不普遍，說明王羲之對「姨母」十分尊敬。而據考證，這個「姨母」可能就是王羲之的啓蒙老師衛鑠衛夫人。王氏與衛氏曾有姻親，故王羲之少時能得到衛夫人的指點。衛氏書風承自曹魏衛瓘、衛恒一系，既古樸又不失姿媚，對王羲之日後形成自己的風格影響當然不可忽視。此文雖僅寥寥五六行字，却極見王羲之對衛夫人感情的真摯。

《姨母帖》字體端莊凝重，筆鋒圓渾遒勁，在體勢上屬於外拓，在筆法上則是以中鋒為主。而中鋒的行筆特點是所書筆劃粗細變化不明顯，用筆深入，整個筆劃厚重、沉著、遒勁，行筆相對較慢，整體宛若一曲沈痛的哀樂，令人心情沉重。《姨母帖》在字的結體上也較為平實，無其他王書的欹側、峻落，在章法上也較為平穩，與篆籀的筆法、結體很是接近，故頗有古質、茂樸之意。這一方面反映出王羲之書寫此帖時的沉重心情，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可由此看出王羲之備精諸體、善於繼承前人書法風格的一面。

可以這樣說，《蘭亭序》是王羲之在老莊哲學影響下、在精神極度自由愜意的狀態下寫出來的，通篇文佳字順，書法變化莫測，傳達出一種輕鬆、愉悅、超然之美。而《喪亂》、《姨母》二帖則完全不同，它們共同的特點都是在一種「悲」的氣氛中寫就，但二者

的「悲」又有不同：《喪亂》是「悲憤」而至「痛貫心肝」，《姨母》則是「悲哀」而至「哀痛摧剥」；一個是激憤難耐而又「無可奈何」，一個是沉痛哀傷而又「情不自勝」。正是這種心情的差別，才造就了二帖在書寫筆法上、章法上甚至整體風格上的不同，從而充分體現了王羲之「情深調合」於其間所起的關鍵作用，也解釋了為何二帖同為一人所書，書風却有如此巨大差異的原因。而理解了這一點，就會對理解為何王羲之會取得如此高的成就，獲得如此高的地位！

王羲之的書法是一個體系，又是後世審美的標杆，影響着一代又一代的書法家。我們引用一下明人項穆《書法雅言·取捨》中的一段評說，就容易理解王羲之作為「書聖」的原因了：「逸少一出，會通古今，書法集成，模楷大定。自是而下，優劣互差……智永、（虞）世南，得其寬和之量，而少俊邁之奇。歐陽詢得其秀勁之骨，而乏溫潤之容。褚遂良得其鬱壯之筋，而鮮安閑之度。李邕得其豪挺之氣，而失之疎窘。顏（真卿）、柳（公權）得其莊毅之操，而失之魯獷。（張）旭、（懷）素得其超逸之興，而失之驚怪。陸（柬之）、徐（浩）得其恭儉之體，而失之頹拘。（孫）過庭得其逍遙之趣，而失之儉散。蔡襄得其密厚之貌，（黃）庭堅得其提衄之法，趙孟頫得其溫雅之態。然蔡過乎撫重，趙專乎妍媚，魯直雖知執筆，而伸脚挂手，體格掃地矣。蘇軾獨宗顏、李，米芾兼褚、張。蘇似肥艷美婢，抬作夫人，舉止邪陋而大足，當令掩口。米若風流公子，染患癰疣，馳馬試劍而叫笑，旁若無人。數君之外，無暇詳論也。」項穆的評判或有失於絕對，但可以說明王羲之書法體系對後世的巨大影響。